

Le Français qui écrit et  
chante en chinois

下有戴亮

Dantès

[法] 戴亮 著 | 王佳蕾 戴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下有戴亮

〔法〕戴亮 著

王佳蕾 戴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有戴亮/(法)戴亮著;王佳蕾,(法)戴亮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27-5657-5

I. ①下… II. ①戴…②王… III. ①散文集—法国

—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1446 号

**下有戴亮**

[法]戴亮/著 王佳蕾 戴亮/译

责任编辑/范炜炜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26,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5657-5/I·3325

定价: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479808

中国，我的缪斯和乐园



## 序言

9月的上海迎来了又一场秋雨。石库门屋顶上略带锈迹的彩色瓦片与早已侵入生活的摩天大楼对照鲜明。周遭的雨滴湿透地面，滴答声掩盖了自行车铃声和轮胎的吱嘎声，甚至将人世的嘈杂也一并抹去，令优雅的卢湾显得更为宁静。薄雾笼不住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摩天大楼将这座城市折射出光怪陆离的色彩。尽管上海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是一个万人云集的竞技场，但我内心依然静如止水。

## 我的 1989

从我有记忆的那刻起，我就想变得与众不同。我总喜欢想象那些在他人眼中，甚至在我自己眼中都不可思议的事情，还会付诸行动。人生总要干出些别出心裁、异乎寻常的事情，才能更好地彰显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

我一边充满着对精彩人生的渴望，一边与循规蹈矩的现实作着抵抗。我每天都为新的领域、新的感受和新的诱惑兴奋不

己。在同学中间，我总喜欢制定规则；而在家长面前，我知道只有平时做乖巧听话的小孩才能在关键时刻说话掷地有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不太喜欢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是更喜欢倾听他人的观点。我喜欢听够了身边人的絮絮叨叨之后，在脑海中闪过创意的火花，似乎在偷偷地告诉自己：“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人云亦云，要别出心裁。别出心裁意味着对另一个个体，或是另一群人的探索。探索这个世界，探索一群人。这个单纯的想法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我。

我从年幼起所接受的教育，无论是艺术、体育、外语、哲学还是旅行，都是为了从头到脚地把自己武装起来，武装成一个茁壮成长的青年人。当然其中不能忘却父母的关爱和良好的家庭环境。饮水思源，方知浩瀚宇宙之中我在何处。

我们还应有些什么要求？

我出生于萨瓦的小城，在 18 岁时来到了里昂这座城市生活。我年幼时迷恋网球运动。然而，我后天接受的教育并不把竞技精神视为一种美德，因此我获取奖章和荣誉的美梦也就戛然而止了。

我的记忆在 1989 年夏天的那个下午之前似乎还模糊不清。

在里昂，靠近米里贝尔-若纳吉公园的小学里，当时五年级的老师非常重视我们的体育，于是我和同学们积极参与到了一场盛大的体育活动中。我熟悉各项体育运动，无论是足球、网球、篮球，还是划船，所以这次活动在我看来了无新意。但我的视线忽然被特殊的一幕吸引住了：人群中间有个和我年纪相

仿的法国男孩，正在表演一种名为 Kung-fu 的武术。Kung-fu 在中文里称为“功夫”，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时，这个名词代表着一个令我陌生的国度：中国。似乎是从那一刻起，中国就钻入了我的思想深处。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对伙伴说，“那个男孩看起来也就和我们差不多年纪，但是他却从骨子里透出一种统治者的风范！”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自己的其他反应了。也许我早把那个将中国功夫动作表演得出神入化的男生视作自己的化身，也许我还询问了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

“说真的，中国在哪儿呢？那里说什么语言？你说那里的人也打网球吗？”

“我也不知道啊！但应该是个挺神奇的地方。好了，走吧。”

1989 年对我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因为那年夏天，我需要决定到哪儿去上初中。我还记得当时在里昂圣-朱斯特中学报读的第一外语是俄文。但在一段时间里，我的思绪无法不被中国所牵引。好奇心让我作出了卓尔不群的选择。在我看来，学习俄语远比学习中文要墨守成规。于是母亲建议我报读里昂最好的中学，让-穆兰中学，因为那里将中文定为第一外语。我们还与校长见了面，校长对我与众不同的选择非常鼓励。在别人看来，这个选择也许代表着危险与虚荣，可是在我看来，它意味着我的成长和存在价值。母亲似乎对即将开始的这段小探险感到很高兴，既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

在五年级的最后一天，教室里每位同学都要说出自己将要



就读的中学。当我说出我将前往全市最好的中学学习中文的时候，就像在班级里投下了一枚炸弹，尤其是我那有些顽固不化的班主任。朋友伊莎贝尔的惊讶程度也丝毫不亚于班主任，因为她本以为可以和我一起读俄语的。但中文是我的首选，同时也是我的荣耀。

于是，我和三十来位同样把中文作为第一外语的学生一起，进入了里昂让-穆兰中学，开始了我们的初一学习生活。第一天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弗雷德里克·普朗蒂埃教授。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教授，一上来就教我们中文语法，还特别讲了“的”在诸如“我妹妹的外婆用尼泊尔情人两年前送给她的美洲大砍刀打她”这样的句型中的特殊用法。在一大堆数学、西方历史和法语语法中，中文学习无疑是一股清新的氧气。

“同学们，努力学起来！现在我念一段，大家跟着我念一段！”

学习中文四个声调的过程中充满了欢声笑语，每次都有新发现。几个月后，学校举办了庆祝春节（2月）的活动，我们班级负责中国的舞龙表演，并且要在鞭炮声中送上传统舞蹈。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中。学校举办的中国节也使我萌生了六年中学毕业后前往中国的念头。

让-穆兰中学底楼走廊里的春节活动结束几个月后，我们迎来了北京马戏团在里昂的演出。那是我第一次和“真正的”中国人合影，第一次腼腆地和他们交谈。

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我坚定地接受着另一种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从而形成了我独有的印欧语系文化。我对生活的看法

与“正常”法国人相比，开始变得有些“极端东方化”。像所有青少年一样，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空间。

我和成年人之间的对话通常围绕着我的中文学习。在90年代中期他们的反应大相径庭。一些人对我学习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语言惊叹不已，对我与众不同的选择颇为赞赏；而另一些人则嗤之以鼻，他们对中文毫无兴趣，对他们来说，中文只是一堆鬼画符，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低劣，中国人只会用细木棍吃饭。总而言之，我被贴上了“中国人”的标签。反正我就想要与众不同，因此对此倒也并不在意。我所读过的那些描写各类功夫的书籍，以及李小龙（Bruce Lee）在西方所建立起的武术形象，都无不激发着我丰富的想象力，想象着那些英雄们如何赤手空拳就征服了世界。这些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将我与中国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尽管我当时对自己的中国梦还没有太多的认识。

说实话，要学好中文对我来说并不实际。班级中真正对中文感兴趣的只剩十几个人，而且我们能与中国人交流的机会几乎没有，这无疑让这门语言更加遥不可及。虽然时间过得很快，学习环境也不甚理想，但我坚定地认为中文是块宝藏，学习中文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虽然在学习过程中有时会受到打击，尤其是学习声调、书写、语法的时候，但是我的学习热情却丝毫没有减弱。要知道，学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我和许多人一样，渴望获得荣誉，希望有成功的人生，完成自己的梦想。这不仅是出于对自己的爱，也源自对父母的深

厚感情，我希望能成为他们的骄傲。法国社会约定俗成的条条框框像个牢笼，因此想要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

“毕竟留在法国也干不出什么成绩来，一切按部就班，毫无意义！”

父亲说：“胡扯，将来你就会知道，法国没那么差。”

“你说归说，我们到时就知道了。我就觉得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

我想要特立独行，不惜任何代价，但前提是要利人利己。我绝不会成为瘾君子，也不会成为酒鬼，更不会在16岁这样的年纪就到处留情，甚至有自己的孩子。

如果说网球职业生涯早已被我抛弃的话，我对管风琴的热爱却是实实在在的。于是我通过家教刻苦学习管风琴。

父母得知我想弹奏管风琴的愿望后，便在里昂的家中为我配备了一架电子管风琴。这架雅马哈牌的电子管风琴是我在90年代初期的必备之品，成了我主要的消遣娱乐。每当我一边弹着管风琴，一边梦想着充满希望荣耀的未来，想象着置身于遥远如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好的愿望居然抚平了我青春期应有的叛逆，一切显得是如此静谧安详。

从第一个和弦开始，我就知道自己的音乐天赋不如网球。指尖的触感灵敏度远不如其他搞乐器的人。然而，在和弦与和弦之间，无论它们是否完美，我都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舒适惬意之情。很快，我的脑海中就涌现了大量的旋律，那些潜伏着的旋律不断萦绕在耳边，久久不散。

在14岁的时候，我狂热地爱上了电子合成先驱让-米歇

尔·雅尔的音乐。音乐、键盘和中国便是他作品的精髓。我常常被他感动。无论是穿行在北京大街小巷的自行车铃声，还是老百姓用普通话或地方方言道出的问候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音配上铜锣和古提琴便能唤起我的东方情愫。我相信正是那个时期的感情确定了我日后来“中央帝国”的选择。整个中学阶段，我都浸沐在雅尔的旋律中，旋律伴随着我每周学习的中文发音，不断丰润着我的想象。不知不觉中，我脑海里的中国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国度，我坚信在那里可以梦想成真。

从那时起，我就很自然地发现了谱曲的乐趣。于是我从最基本的旋律着手，在管弦乐器上开始了笨拙的谱曲生涯。听到电台里播放的音乐，我常常觉得那是我的作品，似乎有个间谍每天晚上偷走了我白天谱写的曲子。我无时无刻不在谱曲创作，乐此不疲。我甚至觉得这样的生活更能显出自己的魅力，并赢得女生的青睐。当时，我既没有读过阿达利有关音乐谱曲的书，也没有学习过任何音乐学和社会学理论，我只知道这世界由两种人构成：消费者和生产者。我决定成为生产者，成为一名创作者、作曲家，拒绝只依靠购买他人的作品而苟且地活着。我想要创作，想要突破自身的局限。为了创作，那些所谓的羞怯都是浮云，我决定奋力一搏。

紫红色的墙纸上面点缀着横状条纹，这就是我的创作室。电子管风琴可以帮助我完成所有声调、音量和强度的控制操作。在悠扬的旋律中，我的想象和思绪挣脱了束缚，自由地四处飘荡。我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坚信自己所选择的生活。

两年后，在一个12月的晚上，父亲送给我一把吉他。我连

续拨弄了几个音符之后，弹奏和弦的渴望便喷涌而出，甚至让我把对管风琴的喜爱都暂时抛之脑后。随后我的曲风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富节奏感，更重视歌词的律动性，而旋律的重要性则逐渐弱化。手中的吉他让我发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自由创作模式。曾几何时，我以为这样的模式根本不存在。从此以后，我到哪儿都可以带着我的吉他，即使在阿尔卑斯山上它也可以相伴左右。虽然管风琴为我打开了通往音乐世界的第一扇门，但是它却只能停留在静止的空间中，停留在想象里，无法陪伴我去更远的地方。我的理想得以确立，梦想渐行渐远，现实生活开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吉他及其旋律带来的小小叛逆感让我兴奋不已。我可以借着音乐的名义，与世隔绝般永远地生活在出生的地方。我完全能够在那紫红色的房间里，在蓝调音乐的陪伴下，就此度过一生。但是，到了十五六岁，我又渴望改变，渴望探索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转眼，我便进入了17岁的雨季。我开始纠结，到底是继续留在由约瑟夫·伯利翁和另两位一年级和三年级同学组成的达克·宇布乐队中担任打击乐手，然后完成所有课程参加中学毕业会考，还是前往中国实现我从选择学习中文的第一年开始就许下的承诺。两年乐队打击乐手的经历得到了身边许多人的赞赏，它让我学会了团队精神和情感分享。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格勒诺布尔的某所中学演出之前，我们乐队的四个人无拘无束地走在街道上，心中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这让我不禁想起怪人乐队在他们演出的前一晚，也是这样走在巴迪（La Part Dieu）购物中心的街道上，当众人的目光都聚

集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简直酷毙了！当时我们四人也像他们一样，演出前浩浩荡荡地走在马路上，像真正的乐队那样，想起来就很棒！”

音乐、友谊、美德，这便是乐队带给我的东西。

1995年夏初的学年末音乐会，在我度过了七年的中学里举行，并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发现音乐对人类有一种神奇的控制力。打击乐手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节奏的强大力量。伴随着音乐的是我们生活的变迁。迎来或是送往，如同出生与死亡。读书的时候我们对此类哲学问题也有所涉猎，而音乐人正是其坚定不移的捍卫者。接下来的中学毕业会考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更重要的是，如同七年前冥冥中所约定的那样，我将在这年夏天前往北京。

## 北京

1995年7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戴高乐机场出发，拉开了第一次远行的序幕。这次活动是由我们在法国的中文老师乔安·贝拉森组织的。我带着一张乐队的宣传图，一本中法字典，再加上自己的青春与天真，登上了开往中国的飞机。飞机上，我认识了一群巴黎阿尔萨斯学校的学生，更令我惊叹不已的是通过舷窗，如此亲近地感受到日出日落。

“你好，这是你第一次去中国吗？”

“是啊，你刚才看见日落了吗？真是太美了！”坐在后面的

一个女生小声说道。

前往中国的漫长飞行似乎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担心诸如飞机有可能数据出错、世界末日可能降临之类的事情，就到了中国。接着，记忆便直接跳到了北京大学。蟋蟀发出的声音与空气中微微的汗味令我记忆犹新。我还清楚地记得校方给我们提供的房间：破旧不堪、布满灰尘，却正合我意。突如其来的新环境，再加上时差，让我们对中国的美好期待打了点折扣。

虽然自认为中文水平还算可以（我从12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但是在北京大学的第一堂课就让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发音有多么不标准。

老师问我：“你是哪里人？”

我觉得这问题太简单了，回答说：

“我是法国人。”

“什么？”

老师居然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接连几次重复之后，我才明白自己必须好好调整发音，才能让别人明白我在说什么！难道我在法国学习的那么多课都白学了？！

现实的第一课便是迅速地与当地人在进行交流。无论是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学生的交流，与法国朋友在各个市场闲逛时的交谈，还是在有中国家长陪着女儿的夜总会里的攀谈，抑或是维吾尔人街区混杂着的阿拉伯文和普通话，都给我的视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我还忘不了那个夜晚：我们三个朋友打算一起去观看中巴足球友谊赛，并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骚动。事情是这样的：走出足球场的时候，我们一路高声呼喊着中方守门员的名字，几分钟后，就有十几个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居然天真地喊道：“到天安门去！”于是人群跟着我们往前走，甚至还因为我们三人中的某人在小店门口买了杯饮料而一起停下来等着。接着警察就来了，他把我们塞进了一辆出租车里让我们回家。直到回到学校，我们都还没有缓过神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当时，在我们那个年纪，以我们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的理解程度，这可谓是大事件了。

乔安·贝拉森很了解我对音乐的热爱和我的中文沟通能力，于是在来到中国两个星期后让我和另两位里昂同学一起去采访中国最知名的摇滚歌手崔健。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听说过他。采访是以文化交流的名义展开的。在乔安·贝拉森的 APB 协会的摄影机下，我了解到在中国，歌手的演唱会或多或少都要接受审批，所以艺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举办演唱会。在将近半小时的采访后，崔健送给我们他最新的 CD，并在上面签了名。之后他邀请我们前往工作室观看他的乐队进行排练，向我们介绍说乐队由一名打击乐手、一名贝司手、一名钢琴手、两名吉他手和五名其他打击乐器演奏者组成。他的摇滚乐，混合了中国传统乐器和摇滚乐器，令平淡无奇的排练达到了音乐会现场的效果。我就这样坐在大排练厅的角落里看着乐队的表演，摄影机很快便被拍得没了电。

排练结束后，我来到崔健的面前，向他百忙之中的会见表



示感谢，还给他听了我的歌曲，他鼓励了我一番。

几天后，我们前往内蒙古游览，途中在承德稍作停留。晚上，我和一个同学同住在一个蒙古包里。我好奇地打开了电视机，正好看到一出中国连续剧，里面有个会说中文的老外扮演的角色。我看得连连点头，因为这场景太有意思了，让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预感，一种可以令我温暖的感觉。

十天后我离开了北京。我承认，北京灰蒙蒙的天空、中国的食物加上潮湿的空气，让我有些许的疲倦。我开始想念法国。

回到法国后，中国的这段旅程在我的记忆中一闪而过，随后便沉寂了下来。大学开学之前，我在圣洛朗迪瓦、阿尔卑斯山和里昂度过了整个夏天。之后，我开始了自己崭新的大学生生涯。关于重回充满文化气息的校园、重回长长的走廊和宽敞的教室以及重新感受学生生活节奏的安逸舒适，我可以洋洋洒洒写上好几页。我将点点滴滴的感悟都凝结在了一首名为《简单》的歌曲中，这是为我在阶梯教室长凳上意外邂逅的一位亚洲女性朋友谱写的。

接下来，在里昂第三大学英-中应用语言专业（我更倾向于称之为中-英）的学习似乎真正将我从中学禁锢的牢笼中解放了出来。每天都遇见新的人，每天都有新的发现。那时候，我觉得学习将我从物质生活中解放了出来，也令我周遭的朋友得以放心。由于这门学科才刚刚兴起，大部分同学都是初学者，因此中文老师给我开设了高级课程。无论是在并不宽敞的教室中整年坚持不懈学习中文的几个学生，还是阶梯教室里那些主修外语、不断向人们展示新衣服的女生们，或是在咖啡馆一边打